

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

蔡鸿生 / 主编

东南亚华侨与广州

牛军凯 / 著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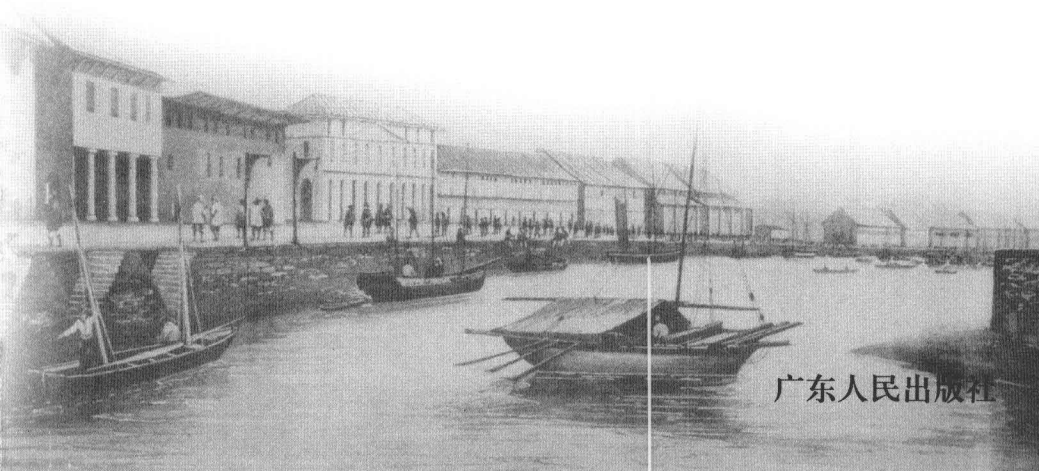
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

蔡鸿生 / 主编

东南亚华侨与广州

牛军凯 /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南亚华侨与广州/牛军凯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2. 12
(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)

ISBN 7-218-04179-5

I. 东… II. 牛… III. 华侨—历史—东南亚 IV. K296.5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0702 号

责任编辑	柏 峰 赵殿红
封面设计	方楚涓
版式设计	翁少敏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(厂址: 广东省韶关市工业东路 33 号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30.25
插 页	16
插 图	137
字 数	550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2000 套
书 号	ISBN 7-218-04179-5/K·857
定 价	80.00 元 (全八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1683 (020) 83503547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编审委员会

主 任：杨资元

副 主 任：程 慧 陈泽泓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李明华 张荣芳 张影华 陈锦鸿

胡巧利 赵春晨 唐文雅 龚伯洪

曾昭璇 曾 新 甄炳昌

执行委员：胡巧利 张影华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编审委员会委托编审委员陈泽泓、胡巧利负责审定本书。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出版说明

当代的地方志工作，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，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。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，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、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。只有这样，地方志的资政、存史、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。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，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、积累地情资料、开展地情研究、提供地情咨询服务、编写地情丛书、整理旧志、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，取得了不少成果。但是，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，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的形式公开出版，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的内容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

- 一、有关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；
- 二、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、研究成果；
- 三、史志理论研究成果。

这套《丛书》的编审工作由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编审委员会负责，并由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将陆续出版，恳望广大读者对本《丛书》的内容、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。

《广州史志丛书》编审委员会

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

总 序

蔡鸿生

广州位于南海之滨，从古代贸易港到近代通商口岸，走过了漫长的路程。它的地形地物，长期被形容为一艘“大舶”，即巨型海船：“花塔、光塔为一城之标，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，二塔其樯，五层楼其航楼云。”（屈大均：《广东新语》卷19）“会城如大舶”一语，尽管出自“形胜家”即风水先生之口，却浓缩着通海放洋的悠久传统，提示后人对广州与海洋文明的关系，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。

时至今日，在广州历史研究中，如何把“舶”字做深、做活、做大，似乎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。蕃舶被洋舶所代替，与和平贸易变成商业战争有什么关系；唐宋时代的舶商与近代形成的“公班衙”，在贸易体制上差别何在；古代的舶牙与清代的行商各自形成什么样的“南海观”和“西洋观”；“舶来品”的经济内涵和文化内涵应当作何理解；登岸后的精神舶来品和物质舶来品有何不同的命运；西学东渐，广州首当其冲。“舶来”与“舶去”的互动关系究竟怎样；缺了一部《广州洋舶录》，载体无影无踪，海港岂不成了空港？如此等等，倘若没有不断地拓展史料，不断地深化论题，不断地改进方法，要想做好“舶”字这篇大文章，对“华夷估舶自成群”（魏源句）的广州作出中西会通的历史阐释，恐怕任何妙笔都是难以生花的。

为了推动“广州与海洋文明”的研究，市方志办不遗



余力，惠予立项，及时地组织了这套知识性丛书的编写工作。承担各个专题的执笔人，都是学有专长的后起之秀。限于体例，他们虽有厚积而只能薄发，化大力来写小书。难道这就英雄无用武之地？西方有句谚语颇能开人心窍：“宁可做小的大作家，不要做大的小作家。”只要在大小之间确定理性取向，缩龙成寸，以小见大，就不会妄自菲薄了。我们要以卓越的史学前辈为榜样，新会陈援庵先生的名著《清初僧诤记》，气格那么高，学术含量那么大，篇幅却只有5万字，堪称“伟大的小书”。面对着潮水式的“泡沫学术”，让我们心明眼亮地取法乎上吧。

《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》的出版，可说是群策群力、集腋成裘的一次学术协作。集腋之劳，分属执笔人；成裘之功，应归方志办。至于我自己，无非是一个吹鼓手的角色，虽应命撰序，其实奏不出什么雅韵高潮，只不过说几句想说的话而已。

2002年8月28日写于中山大学



目 录

第一章 从“叶落归根”到“落地生根”

——东南亚广府籍华侨的由来和变迁 1

- 1 近代以前以海商、政治避难、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3
- 2 近代以契约华工等形式的大规模出海 9
- 3 民国时期广府华侨出国 15
-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南亚的广府华侨 19

第二章 无远弗届与小广州

——东南亚广府华侨的分布与聚居 25

- 1 广府华侨在越南 26
- 2 广府华侨在柬埔寨 33
- 3 广府华侨在老挝 35
- 4 广府华侨在泰国 37
- 5 广府华侨在缅甸 41



6 广府华侨在菲律宾	45
7 广府华侨在印尼	48
8 广府华侨在马来西亚	53
9 广府华侨在新加坡	59
10 广府华侨在文莱	63

第三章 从小商小贩到商业巨亨

——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与生活	65
1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职业	66
2 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广府文化	78
3 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教育	81

第四章 五缘社会的华侨组织

——广府华侨在东南亚的社团与组织	8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 赤子情怀与华南巨变

——东南亚华侨与广州的发展	100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主要参考书目	121
--------------	-----



第一章

从“叶落归根”到“落地生根”

——东南亚广府籍华侨的由来和变迁

近代以前以海商、政治避难、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

近代以契约华工等形式的大规模出海

民国时期广府华侨出国

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东南亚的广府华侨

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，数千年来与海外联系不辍。广州地濒南海，对外交通便捷，历史上不乏人口的移入与移出。既有阿拉伯、波斯、占城等地侨民的聚居，也有不少广州人移民海外。侨居海外的中国人，近代多以方言结群，形成福建、客家、潮州、广府（广肇）、海南等群体。广州地区长期以来使用广州方言，俗称白话，又称粤语。讲粤语方言者主要分布在明清行政区划中的广州府和肇庆府，其中又以广州府为代表，所以侨居海外粤语方言族群被称为广府帮或广肇帮。历史上的广肇地区包括今广州、佛山、珠海、江门各市县及湛江、茂名、深圳、东莞、韶关、肇庆部分县区。此外，历史上由于人口迁移，在粤语方言区也生活有不少讲客家方言者，他们出国后都加入了客家帮，并不属于广肇帮。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历史上属于广肇帮的华侨。

移民海外的华侨，分布遍及全球，其中最重要的聚居地为东南亚，集中了海外华侨的 2/3 以上。广府华侨也不例外，东南亚是广府华侨最集中的地区。



1

近代以前以海商、政治避难、求法僧等形式到东南亚的广府华侨

广肇地区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一部分是从秦朝开始的。前 214 年，秦始皇攻略百越，在岭南设置桂林、南海、象三郡。南海郡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广东省。西汉淮南王刘安撰述的《淮南子》记载，秦始皇攻略百越的目的之一，是为了获得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珠玕等宝物。这类产品有很多自海外输来，先秦时期广东商人中应该也有跑外洋的，可能就有经常侨居国外者。到了汉朝，中国与海外的联系更加密切。《汉书》记载了汉代中国使节从华南沿海出外访问和通商的情况。他们的出发点是日南（今越南中部）、徐闻、合浦，最远到达印度南部。出海时，他们首先坐中国船只，到达第一个大港都元后，再乘“蛮夷贾船，转送致之”（班固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。当时华南沿海的中国船主要是越人船只，越人是今日不少广东人的祖先。越人是卓越的航海者，活跃于南中国海沿岸。东汉时，今越南中部的朱吾县民不堪当地官员的残暴，相约逃至屈都乾（即都元），就是因为当地常有中国越人商人和水手光顾。此后，屈都乾又聚集不少的中国人，成为汉代至魏晋时期东南亚最有名的

华侨聚居地，以致不了解东南亚情况的西方商人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港口，他们说“喀提加拉(即屈都乾)是一个秦奈(中国，CHINA)港口”。屈都乾大约在今日泰国的东南部，当地的华侨以华南沿海的越人为主，其中不乏广肇地区的先民，可谓早期的广府华侨。

在唐代，有广州求法僧人移居东南亚。据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记载，义净在印度求得大批梵文佛典后，在室利佛逝(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)进行翻译和研究，不久，又回到广州招徕助手，僧人贞固、法朗、孟怀业、道弘随他到了室利佛逝。后来，法朗死于印尼，贞固和道弘随义净回国，孟怀业“恋居佛逝，不返番禺”(义净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·重归南海传》)，定居在东南亚。

比较确切记载广府地区人民移居海外是在唐朝末年。唐末黄巢起义，879年起义军攻下广州，出现社会动乱，当时唐朝南方对外贸易中心是广州，有不少外籍侨民如阿拉伯、波斯商人聚居，不少广州人为躲避战乱，随外籍商人出逃海外。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在其著作《黄金牧地》中记载，在巨港(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)一带有很多华人，据说是为了躲避黄巢起义从广州迁来的。他们是因政治和宗教原因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。

有唐一代，虽然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已有一定水平，但在南海地区控制贸易的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，以



及一些东南亚商人，所以广州一带人民出海经商者还不是很多。到了宋代，由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，西北“丝绸之路”衰落，海外贸易得到大大发展，加之中国造船技术提高，商人经济势力增强，不少海商经常出外经商。宋代人朱彧记载他在广州的见闻说：“北人过海外，是岁不还者，谓之住蕃。……广人举债息一倍，约舶过回偿。住蕃虽十年不归，息亦不增。”（朱彧：《萍州可谈》卷二）说明当时广州商人出海经商，经常多年不归，侨居国外。宋代还有记载说：“入蕃海商……或名为住冬，留在彼国数年不回，有二十年者，取妻生子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二》）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广州地区人民侨居国外已不是个别现象。

宋代末年，广东尤其是珠江口一带是宋朝抵抗元军的最后据点，抗元失败后，不少当地人民随宋朝官兵逃往海外，他们主要逃往中南半岛各国的南中国海沿岸。如安南，在元初军队征安南时，就有宋朝人在安南军中共同打击元军。在今日越南中部，还有有关宋朝王公之妻赵娘子的传说。如占城（今越南中部的古国），宋末宰相陈宜中抗元失败后，首先逃至占城，后来又逃往暹罗（今泰国）。元代曾记载占城有不少华侨，占城人懂汉文化者很多，这都可能与宋末来自珠江口一带的大批移民有关。

元代末年，中国内乱，又有不少广府人移居东南亚。据历史记载，在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，明初“有梁

道明者，广东南海人，久居其国，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，推道明为首，雄视一方”（张燮：《东西洋考·旧港条》）。梁道明就是元末迁至印尼的广府华侨。在爪哇岛也有不少广东华侨，明初记载有杜板“此处约千余家，以二头目为主，其间多有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”。又如新村“原系沙滩之地，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，遂名新村，至今村主广东人也”（马欢：《瀛涯胜览·爪哇条》）。其中不乏广府移民。暹罗（泰国）也是元末移民聚居地。明初暹罗出使中国的使臣中，不少是华人，多是广东籍。

明初为保持政局的稳定，实行海禁政策，影响了华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。许多移民海外的华侨不敢回国。为暹罗做使臣的华人许多改为泰人名字，不敢承认自己是华人。明代中期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广东沿海与东南亚的走私贸易增多。贸易的发展迫使明政府开放海禁。16世纪中叶，隆庆皇帝解除海禁，允许商民出海贸易。广府地区移民形成新的高潮，出海者“十倍于昔”，侨居地包括当今东南亚各地，如越南兴安，近年发现的17世纪初华人赞助庙宇的碑文中，就有不少广府侨民。

明末清初，国内改朝换代，战乱频仍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清政府为切断沿海地区同台湾郑成功集团的联系，实行禁海政策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又颁布“迁界令”，实行迁海政策，东南沿海居民从海岸向内地迁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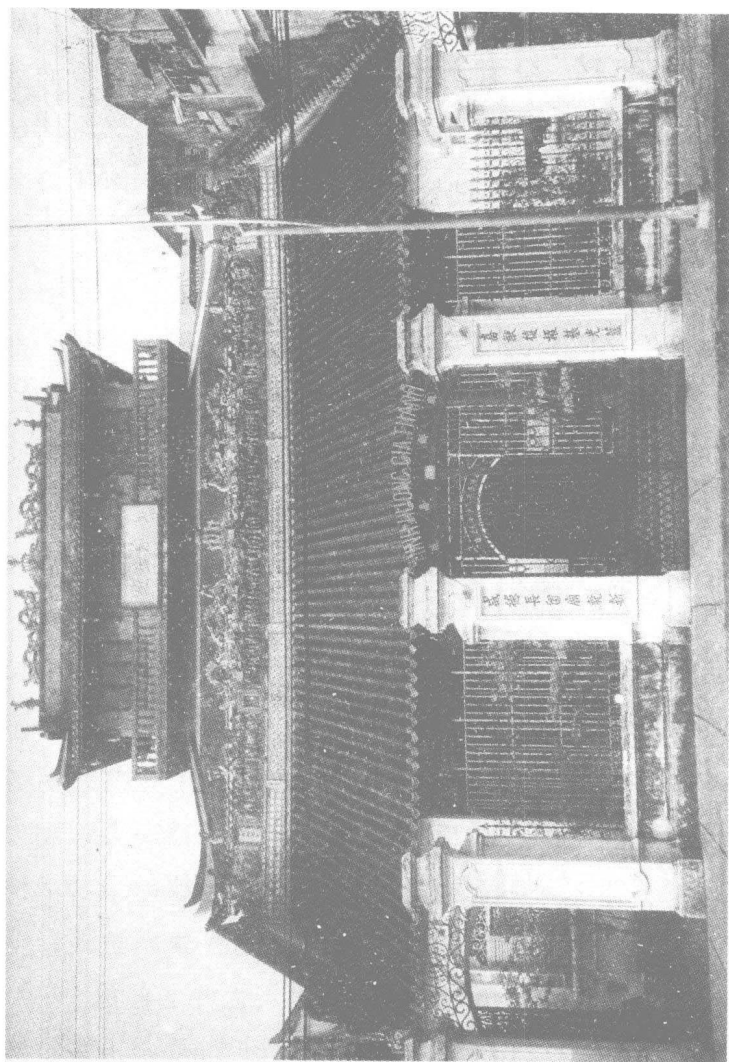


数十里。不少农民渔民流离失所，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工具，被迫移民海外。当时广肇地区顺德、番禺、南海、香山(中山)、恩平、开平、新宁等地都在迁海之列。如康熙十年(1671)，海康县人莫玖，带领同乡数千人渡海到柬埔寨，柬埔寨任命其为芒坎屋牙(港主)。莫玖将该地易名河仙，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和文化，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侨聚居地。

莫玖与其子莫天赐治理河仙达百年之久，此后他们接受越南广南阮氏政权的保护，使河仙成为越南的一部分。大约同时，明朝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和龙门总兵杨彦迪，率领所部反清将士，逃往越南广南政权，广南阮氏令其垦殖东浦地区(今越南胡志明市一带)。这部分讲粤语方言的移民集团，成为早期开发湄公河三角洲的主力队伍。

明末迁移越南南方广南政权的反清人士，为了维持“明朝香业”，结成明香社，当时在越南南方各地有不少明香社。陈上川等人也在广南政权同意下成立明香社。清朝掌握全国政权后，从中国再来的移民大都剃发结辫，就不能加入明香社，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“清河铺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明香社的反清色彩越来越淡，明香也改为明乡，成为归籍华侨或中越混血儿的代称。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台湾统一，政局安定下来，清朝解除了海禁。此后随商船出海，或偷渡移民的广府人又开始增多，但清政府禁止移民海外，也不保护海外侨



以广府人后裔为主的明香人在西贡的明香会馆

